

宜大姐送行

△1984年5月韦君宜(左)与作者摄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她去了,安详,平和,宁静。

2月1日,一个灰色的日子,我手握沉甸甸的讣告,怀着一颗更加沉甸甸的心,前往八宝山大礼堂,为君宜大姐送行。

灵堂内外摆满了花圈。一副副挽联,一首首诗词,表达了亲人、挚友对她的深情追思和沉痛哀悼。大姐安卧在翠柏丛中,像是长途跋涉者走到人生最后的驿站熟睡了一般。我在告别仪式开始前,走进灵堂,眼含热泪,久久伫立在君宜大姐灵床前,默默和她告别,依依不忍离去!

我和君宜大姐相识,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1982年二月,《文艺报》邀约了近十位文艺评论工作者,集中在西苑饭店命题撰文,由我评论韦君宜新近发表并引起文坛反响的中篇小说《洗礼》。为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和追求,我与刘思谦结伴初访韦君宜。交谈的时间并不长,但她的诚恳坦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已觉察到,作家韦君宜选择了一个独特的文学视角来观察社会,反思历史,描摹人生,她已经着手建立老干部人物画廊,《洗礼》中的王辉凡是这个画廊中由愚忠到觉醒的独具个性的文学形象。后来,我写成《苦难中觉醒——评韦君宜的小说〈洗礼〉》一文,发表在当年的《文艺报》上。翌年,我收读了君宜同志赠送的第二部小说集《老干部别传》。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和研读君宜同志出版的每一部新作,也是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建立起经常的往来和恒久的友谊。

作为老干部,君宜同志熟悉她置身其中的这个曾历经枪林弹雨、为创

建新中国立下功勋的特殊群体，为他们立传，构建起老干部形象系列；而作为女性，君宜同志对女性的现实处境和前途命运，倾注了更多的关爱和热情。她的第一部小说集以《女人集》命名，即可见出她的创作主旨和用心。1984年，我应约编选一部《妇女小说选》，请君宜同志作序，她欣然命笔，以《女人的文学》为题。在这篇文章中，她首先说到她少年时代最爱读的一部书是《再生缘》，女主人公孟丽君的“志愿、她甘愿为之付出牺牲的自我克制的性格”，强烈震撼她少女的心，使十六七岁的君宜自觉到自己是一个妇女，将来要走艰难的路。她写道：“妇女而从事写作，没有谁不曾克服许多艰难困苦，不曾跨越许多矛盾。”她认为：“男作家写妇女，好像总不如女作家写的那样，能探到内心深处”，“男人一般不如女人那样了解女人。”她感叹道：“作为一个妇女，所背负的历史重负，实在是极沉重、极难摆脱，又极微妙、极敏感的。往往男子还看不到的对妇女的那一点儿歧视，好强的妇女本身立即就敏锐地感受到了。”接着，她列举了女性那“更纤细、更潜在的触痛点”，那“更复杂、更难把握的专属妇女的灵魂颤动”，她们所遭受并忍受的种种歧视、抱怨和感情折磨，她满怀深情地呼吁：“妇女，所有作为母亲、姊妹、妻子、女儿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大写的女人的，我们的慈爱、温情、痛苦、忧郁以及艰苦卓绝，都应该活在我们的作品里，活在我们的心里，和我们的兄弟们一样。”君宜大姐喊出了女性作家共同的心声。

正是出于对中国妇女处境命运感同身受的同情和理解，君宜笔下的人物形象以女性居多，建立了她小说中女性形象的长长系列。即使是老干部形象，也是女干部为主。在这些不同经历、遭际、前途、命运的女性人物身上，倾注了君宜大姐的爱心和激情。

1986年初，我收到君宜大姐寄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母与子》。这是一部有着宏阔历史背景和丰厚社会内容的作品，女主人公沈明贞是当代女性文学中相当动人的形象，作者说这是她20年前即开始撰写的作品，由于文革及其他原因，延宕至今。君宜同志悉心塑造了沈明贞的光辉形象，将一位深明大义、勇于进取、甘作牺牲的革命母亲的文学典型

送进文苑。

君宜大姐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有着很高的艺术追求。她多次谈到她的作品都以亲历亲见的现实生活为依据，“老老实实按自己所看到所认识到的去写”，不瞎编、不矫情。她认为：“小说是写现实生活的，我就觉得现实生活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没有装腔作势的必要。”1984年，《北京师院学报·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专栏，评介君宜同志的创作，请她写一篇创作谈。其时她正参加编写“一二·九”运动史，撰史之余，她寄来一篇《弃文治史有感》。文章谈了她治史的感受，由写史对事实细节的严格选择，联系到文学的细节选择，她说：“我忽然觉悟了，严格选择细节，恐怕不止对于写历史是必要的，对于写小说也非常必要。我自己就知道自己，写东西常常水分太多——一句话，严谨不够，假若我写小说能像写历史这样选材严谨，这样的惜墨如金，多好！”她严于律己的精神和不懈的艺术追求，使我深受教益。

1986年仲春，君宜大姐突发脑疾，卧床不起，我曾数次趋前探望。她对疾病并不悲观，跟我谈如何治疗、服药、针灸，甚至要约请上海的气功师。她的乐观和信心感染了我，我想，大姐会重新站起来，继续投身她一生钟爱的文学事业的。90年代初，黄秋耘同志来京，暂住崇文门君宜大姐家，约我和阎纲一同小聚。一进门，就看见大姐正扶着助步器艰难地练步，每移动一步，都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从房间到客厅短短的距离，她已经累得大汗淋漓了，但她不愿停歇，接着又练。这种和疾病顽强抗争的精神，令人钦敬。

君宜大姐卧病十余年，始终未放下手中之笔，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常人难以忍受的痛楚，用艰难握笔的颤抖的手，直言不讳，书写她亲历的历史和人生。我们不断收到她的赠书：《旧梦难温》、《海上繁华梦》、《露沙的路》、《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韦君宜》，手捧着这些凝聚大姐心血和激情的作品，感到重若千钧，灵魂被强烈震撼。《露沙的路·后记》中说：这本书“写的时候，已经是脑溢血发作过，半身不遂，手脚都不方便了。只有脑子还有一部分管用，心想，人活着，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谁病到这样还写小说呢？但是我得写。一

天写一点点，今天记住明天要写的内容，用了过去写两个长篇的劲，写了这十来万字。”读到这里，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睛。

君宜大姐是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她的作品既是文学，又是历史，它真实地反映了她那一代人所经历的曲折多艰的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进程。我在一篇文章中间说过：“在当代卓有成就的女作家中，韦君宜独具与众不同的个性风采：她不是在风华正茂之年即取得令人眩目的创作成就，而是步入老年之后才进入文学创作的辉煌时期；她没有清静的环境、充裕的时间潜心创作，而是在异常繁重的领导工作、编辑业务和社会活动之余辛勤笔耕；她无暇也不屑于咀嚼个人小小的悲欢，而是将敏锐深沉的目光专注于人生和社会，深情关注着人民的苦乐悲欢和祖国的前途命运。这就使韦君宜的作品自然具有历经沧桑的鲜明印记和包含丰富社会内容的历史厚重感。”

在告别仪式归来的路上，我与君宜大姐的老战友、82岁的离休老人李公天同志同行。我们谈起君宜同志为人时，他说：君宜表面上对人较平淡，实际上她对同志、朋友怀着火一般的热情。今天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层次高，是一次高质量的告别仪式。我亦有同感，来者大多是中老年人，有些是和君宜大姐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的曾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有几位耄耋老人行动困难，是由年轻人搀扶着来和她告别的。这个肃穆悲凉的场面深深感动着我们，多么深厚绵长的友情啊！

生活中的大姐极重亲情和友情。她积20多年的夙愿，锲而不舍地要创作长篇小说《母与子》的动因，除了要为这位革命母亲立传、反映她所经历的那个悲壮多灾的时代之外，书中还处处洋溢着她对女主人公原型杨肖禹老人的崇敬热爱和浓烈的亲情。

1984—1985年，君宜和秋耘曾数度集中在中共中央党校，撰写“一二·九”运动史。那儿离我的住处较近，我几次前去看望他们。我们三人或在安静的办公室内饮茶谈心，谈文学，谈生活，谈文坛，谈世道人心；或在绿树婆娑的林荫道上漫步；或去香山公园散心。那几次的相聚是君宜大姐最最放松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去香山，正是初秋

季节，秋耘提议坐缆车到山顶，登高望远，观赏青翠欲滴、尚未转红的枫叶，大姐和我欣然同意。我们坐在缆车上悠然上升，翠盖如云的树冠缓缓移过足下，真有身登青云梯、飘然欲仙之感。那天，大姐和秋耘同志的兴致很高，我们在香山顶上驻足良久，徘徊远眺，然后又乘缆车飘下。

还有一次盛夏，我去党校看望他们，大姐身穿一件蓝底白花的旗袍，朴素优雅，透出青春气息，似乎连空气也变得清新了。交谈中，大姐提及当年“一二·九”运动的往事，听着听着，我的眼前仿佛出现热情奔放、慷慨激烈、年方十八的女大学生韦君宜。那次聚会的印象久久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1996年二月中旬，我和阎纲领着孙儿去协和医院探视君宜。大姐这次犯病较重。她躺在床上，说话含糊不清，但脑子清晰，捕捉声音的能力较强，还可读书看报。我送她一本新出的文学评论集《女作家笔下的女性世界》，内收三篇评她小说的文章。大姐显得十分高兴，示意护士将赠书放在她的枕边，并请护士取来她的新作《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韦君宜》赠我们。护士对我说：“老太太新来的这本书，她不轻易送人呢！”见大姐兴致未减，阎纲告诉她新近完稿的评《露沙的路》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悲剧》，并读了其中的片断给她听，她听得很专注。她见孙儿站在床那边，就示意让孩子走近，紧紧拉住孩子的手，久久不放，眼神里流露出老祖母般的慈爱。我们借助护士的翻译和大姐交谈，动情之处，她的眼角涌出泪水，我也情不自禁地泪眼迷蒙。

君宜大姐患病十余年间，在缠绵病榻之际，用她那僵直麻木的手，创作了长篇小说《露沙的路》、回忆录《思痛录》和数十篇杂文随感，倾诉了她对我们共和国、人民及未竟事业的热爱和痴情，坦示出她为之奉献了一生的赤诚的女儿心！使我们捧读时心潮激荡，热血沸腾，涌起和她一样圣洁庄严的感情。

大姐，你已经用你那坚强意志、顽强毅力、超人的拼搏精神创造了你生命史上最后的辉煌。安息吧，君宜大姐！

(责编/朱宝柱)